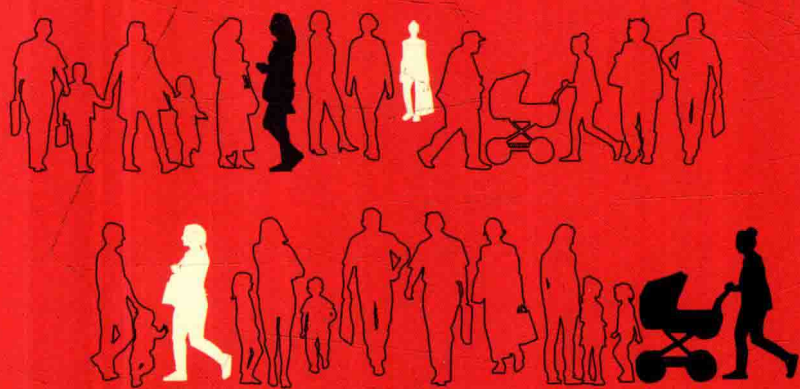




从“外来妹”到“外来媳”：

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研究

张琼 著

出版社



从“外来妹”到“外来媳”

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研究

张琼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外来妹”到“外来媳”: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研究/张琼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309-13782-8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婚姻-移民-研究-中国 IV. ①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581 号

从“外来妹”到“外来媳”: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研究

张 琼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54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782-8/D · 94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受浙江树人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还受浙江树人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4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7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10

第一节 理论视角 / 10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14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23

第三章 流动：婚姻移民的初期城市适应 / 34

第一节 童年时期的家乡生活 / 34

第二节 青年时期的外出动机 / 42

第三节 职业适应 / 51

第四节 语言适应 / 62

第五节 初期城市适应的代际差异 / 74

第四章 落地：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策略 / 81

第一节 两地婚姻市场 / 82

- 第二节 结识途径 / 89
- 第三节 婚姻决策过程 / 94
- 第四节 婚姻实践模式 / 107
- 第五节 婚姻实践的代际差异 / 112

第五章 生根：婚后多层面城市适应 / 116

- 第一节 家庭生活适应 / 116
- 第二节 经济生活适应 / 139
- 第三节 社会生活适应 / 149
- 第四节 心理层面的适应 / 170
- 第五节 婚后城市适应的代际差异 / 181

第六章 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嵌入与自主 / 184

- 第一节 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嵌入过程 / 185
- 第二节 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主体策略 / 189
- 第三节 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的结论性注释 / 193

主要参考文献 / 201

- 附录一 意见征询书 / 209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211
- 附录三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213

后记 / 216

第一章

绪 论

非上海户籍的、因婚姻进入上海本地生活的外地女性被称为“外来媳妇”，她们成为新居民后需要适应环境，克服语言、风俗、价值观、文化差异等障碍。本章从人口流动背景入手，介绍婚姻移民之城市适应过程的分析框架，并分析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愿望因诸多障碍而显得困难重重。但是，女性一直没有停止向上流动的步伐，她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婚姻这一特殊路径，逐渐成为事实上永久性移民而实现城市化。近年来，全国各个城市中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外来媳”，她们同时具有移民、媳妇角色所赋予的“双重外来者”的身份，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群体之一。

一、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殊路径

在中国传统中，女性有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的文化传统。中

国家几千年来沿袭的是父权制，家庭以父系纵向传承，体现在婚嫁制度上，即“男娶女嫁”，女方出嫁后到男方落户，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所生的孩子也随父姓。这种“从夫居”的习俗，使女性可以通过婚姻从一个地区迁入另一个地区，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限制，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进而实现水平流动甚至是垂直流动。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但是从现实的婚姻市场来看，普遍存在一种男性“下娶”和女性“上嫁”的婚姻梯度现象。这意味着女性流动人口的中上层更容易和城市底层男性结合，通过婚姻实现迁移进而获取市民资格的人口，具有明显的性别选择。

在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婚姻迁移的性别选择倾向。通过比较人口迁移原因的性别差异，可以发现，在所有的迁移原因中，男性在很多原因中数量都大于女性，而只有在“婚姻迁入”和“随迁家属”两项中，女性的数量大于男性^①。因此，尽管大部分女性流动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和目的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是寻找婚姻伴侣、建立家庭是女性流动或迁移的直接或间接目的之一^②。所以女性的流动以婚姻流动为主，她们“以婚求动”或“动中求婚”，即通过婚姻迁移达到流动的目的，或是以流动达到婚姻迁移的目的^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流动，为城乡联姻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我国各地的城市甚至农村都出现了一定规模“外来媳”，城乡联姻或者两地

① 张为民等：《我国劳动力迁移流动的特征》，《统计研究》2004年第6期，第4页。

② 谭琳、苏珊·萧特、刘惠：《“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75—83页。

③ 沈文捷：《她们嫁给城市——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生活状况透视》，学林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第46页。

婚姻的规模和范围都大大扩展。

二、上海“外来媳”现状

与全国城乡联姻趋势相同,上海两地婚姻大量增加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沪女外男”与“沪男外女”两种模式中,以本地男性娶外地女性为主。如 1991—1995 年,两地婚姻中一方为外地女性的占 91.6%^①。2014 年数据显示,“两地婚姻”50 094 对,占上海居民结婚登记总数(除涉外)的 36.15%,连年上升的两地婚姻下降近一成,但是外地女性和本地男性的结合并没有减少,“外来媳”与“外来女婿”的比例达到了 2.5 : 1^②。

调查发现,“沪女外男”模式中,上海姑娘嫁给了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外来女婿,双方文化程度高,就业层次也较高,家庭经济情况好,双方对已建立的家庭很珍惜,因此多数家庭的婚姻较为稳定。而“沪男外女”模式属于城乡边缘群体的“弱弱结合”,女方主要来自外地农村,自身文化程度偏低,缺乏职业技能,同时又由于户籍的限制,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而作为“外来媳”配偶的上海男性,多数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下岗和失业的比例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他们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家境不好、年龄偏大、残疾、身体不太健康,或是“吃过官司”。配偶在城市的社会底层位置,让“外来媳”在上海的生活也并不理想,低学历、低收入、低工作层次是其现实状态,找工作难、户口问题、经济困难和住房困难一直是困扰部分“外来媳”的最主要问题。就业方面,上海“外来媳”的就业率仅为

① 周海旺:《上海市外来媳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33 页。

② 《沪外地媳妇多于外来女婿 三四十岁最易离婚》(2015 年 3 月 19 日),搜狐网, <http://roll.sohu.com/20150319/n410013381.shtml>, 最后浏览日期: 2016 年 5 月 18 日。

34.5%，其中九成从事钟点工、家政服务、临时工、零工等工种，收入微薄且不稳定，还有26.2%的“外来媳”婚后从未就业^①。另外，“外来媳”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她们的非正规就业性质决定了所在用人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按相关规定缴纳社会综合保险^②，而从事家政服务的“外来媳”由于没有所属单位，根本无法享受外来人员综合保险。

第二节 分析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婚姻移民在不同阶段经历的城市适应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因素的发挥，结合生命历程理论对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进行分析，认为：（1）婚姻移民是从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家庭空间逐步深入地嵌入^③城市社会结构中的；（2）婚姻移民具有主体能动性，这两点均可反映在她们在城市日常生活实

① 陆建民：《上海部分“外来媳”状况调查》，《中国妇运》2005年第9期，第22页。

② 2002年9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123号令发布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规定用人单位均应为其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2004年8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34号令发布了《关于修改〈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完善了综合保险办法。外来人员综合保险不是商业保险，它是上海市政府强制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办理的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按月缴费。综合保险的缴纳对象是正常就业中没有上海户口的且未办出可交社保的居住证的外来劳动者，有三类人员不在这个范围中：一是自然人雇用的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二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最后一类是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综合保险包括工伤险、养老险、医疗险，每人的月保费是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7.5%。

③ 波兰尼(Polanyi)首先提出有关“嵌入性”理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行为本来就陷入一种结构或另一种结构的社会关系中，发展从本质上导致了镶嵌的种类而不是程度的变化。1985年，格兰诺维特把“嵌入性”引入社会学领域，拓宽了经济活动可以嵌入事物的范围，即不仅仅是把它放到制度架构中，还放到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去讨论，“嵌入性”视角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参见[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践的行动流当中,这个行动流也就成为她们纵向和横向交织的城市社会适应过程(详见图 1-1)。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下,成为“外来妹”和成为“外来媳”是婚姻移民生命历程中的两大重要转变,根据这两大转变,本书将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城初期、婚姻抉择时期以及婚后市民生活,即流动、落地与生根。但是,这几个阶段之间,并非有一个清晰的边界,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以生活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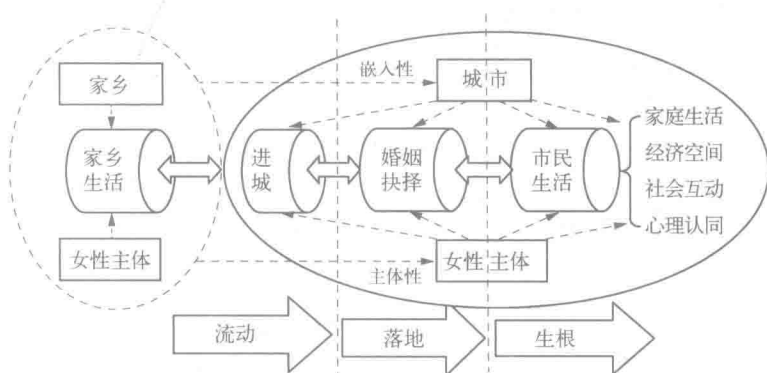


图 1-1 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生命历程分析框架

生命历程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灵活性,它是一种动态的方法,能够容纳许多不同的文化、历史、社会和个人变量,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的方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联系起来。生命历程的研究模型^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 区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同批人效应。这三个概念对于用生命历程方法研究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非常重要,笔者根据这三个效应的区分,根据年龄效应把婚

^① J. T. Mortimer, and M. J. Shanahan, ed.,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Springer Press, 2003, pp.3-39.

姻移民按照年龄大小排序,并根据时期效应和同批人效应,以1978年^①为界限,把她们大体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婚姻移民,考察她们城市适应的代际差异。(2)事件史模型。事件史模型尤其适合生命历程转变分析,对于分析婚姻移民生命历程中成为“外来妹”和成为“外来媳”这两大角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3)典型时期模型和纵向数据。显然,生命历程理论注重动态性,强调以动态的时间概念来定位行为和事件,把这些行为和事件看作早期情况的发展延续。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就是这样的一种纵向过程,从进入城市的那天开始,就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适应情景,然后有逐渐发生的改变,而这些转变也与进城初期的城市适应有不可分割的联系。(4)潜在的结构方法。它有两个特征:一是采用角色汇聚模型来研究生命历程,二是采用生命路径模型来研究生命历程。由于社会适应涉及多方面的现象,包括心理取向和行为取向、过去经历和未来行动、年龄和同龄群体影响、社会网络、历史和制度的背景的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中的社会角色的连接和变迁等,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婚姻移民个体的生命历程,可看到个体与社会结构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她们城市适应的生命历程是复杂的,也是流动且具有变化的。(5)叙述研究。即让婚姻移民以回溯的方式来反映她们城市生活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这些生命故事的叙事分析,从中发现社会因素、社会事件和个人因素等之间的相互

^① 以1978年为两代婚姻移民的分界点是在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到本书研究对象的特点,因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出生日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都有,如果按照当前对农民工研究中比较普遍的1980年为界限,则两个群体的比重会差别比较大,因为出生于1980年后的农民工虽然已经很多,但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流动人口已经结婚的却要少很多。所以,本研究的两代婚姻移民年龄最大差距是30年,第一代婚姻移民的出生年份在1957—1978年,有16人;第二代婚姻移民的出生年份在1978—1986年,有9人。

联系。

全书结构主要按以下脉络展开。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缘起和问题的提出,进而从宏观研究背景展开讨论,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章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出发,细化具体的研究构想和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本书的核心概念,最后简单介绍了调查地点的选择、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资料的处理与分析等整体研究设计。

第三、四、五章分别讨论了研究框架中提出的城市适应过程的三个纵向阶段。第三章分析婚姻移民的初期城市适应,从童年的家乡生活到青年的外出就业动机,分析城市初期生活的语言、职业等表层城市适应特征以及代际差异。第四章分析婚姻移民的婚姻抉择过程,从认识途径、婚姻抉择过程中本人以及双方父母态度、婚姻实践模式等几个方面,探讨她们的婚姻实践中的婚姻策略以及存在的代际差异现象。第五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从家庭生活、经济空间、社会互动以及心理认同等多个层面,全方位考察婚姻移民的婚后复杂的城市适应层面,以及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代际差异。

第六章是本书的结论。笔者从微观个体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互动中,探讨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过程性、主体性和代际差异性,引发对婚姻移民三重累积劣势和移民政策对婚姻移民城市适应不利影响的思考。

第三节 研究意义

本书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将婚姻移民群体在城市的流动、落地与生根的动态纵向适应与经济、社会和家庭不同的横界面适应相结合,以历史纵向与横向兼容的角度来研究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内容和代际差异,为城市社会适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不仅在以往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因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而引发的城市适应过程中经济、社会、家庭和心理层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动态角度探讨婚姻移民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适应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交叉与相互制约,同时注重对婚姻移民的女性经验的挖掘,实现女性流动和迁移的社会性别追问。

其次,本书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原有的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单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生命的持续影响。本书对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研究中,强调多个重大事件介入既有生命历程的累积影响,认为在生命历程研究中,一个特定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会受制于生活中其他事件的影响,对特定事件影响的考察无法独立进行。这种视角弥补了以往大多数生命历程分析只研究单一事件影响的不足。

再次,本书把婚姻移民群体放在全球资本流动与国内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中,采用“主体—实践”研究范式,直指婚姻移民的主体性问题。本研究将婚姻移民看作主动寻求生活境遇改善的“主体”,在城市日常生活实践中,主体性作用体现在女性主动适应城市社会与城市社会对女性主体进行塑造这对力量相抗衡的过程。笔者通过婚姻移民的主观诠释,描述她们的城市生活实践和行为策略以及在城市中的现代性体验与获得,以此说明婚姻移民的城市生活世界和生存状况,试图超越传统的客观描述理论视域,增加对这一群体的理论认识。

最后,本书丰富了对婚姻移民群体的认识。在少数对婚姻移民群体的调查和研究中,一般都是把她们归入整个迁移人口中进行分析 and 讨论,这样的视角容易忽视群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行动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本书从代际差异方面分析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生命历程,将有助于人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加深对婚姻移民的整体了解,从而为该领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的现实意义体现如下。

第一,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目前流动人口大约有 1/3 是女性,她们大部分回到家乡成家,但是也有一部分成为婚姻移民。她们或者与流入地的城市男性结婚形成城市婚姻移民,或者与流入地的农村男性结婚形成农村婚姻移民,或者与流入地的男性相识后结婚成为非流入地也非家乡的其他地方的婚姻移民。虽然目前并没有来自全国的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无疑她们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也引起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关注。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增强这种关注度。

第二,有助于增强婚姻移民与家庭、社会的融合。本研究采用座谈会、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侧重考察婚姻移民的主体感受,通过发掘婚姻移民与其家庭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互动和融合的方式,为她们提供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机会,实现城市生活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公正,有助于消除她们的孤独和边缘感。

第三,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婚姻移民群体的认识,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在 Z 区妇联的帮助下,了解婚姻移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了解婚姻移民的城市社会适应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她们融入社会所需的相应环境。把学术范围内对婚姻移民的关注扩大到政府部门甚至是全社会的关注,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本章在绪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思路,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建构整体篇章的结构框架,并针对这些研究内容进行具体的研究设计。

第一节 理论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出现了“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概念。这种观点主张不考虑作为社会集团的家庭,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身上,将与其一生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事件视为他的“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埃尔德(G. H. Elder)。他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和 1910 年左右出生的两代青少年为样本,研究了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在埃尔德看来,生命历程是指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这里的“年龄”概念本身就跨越了个体层面,体现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再到纵向的空间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

程轨迹的建构^①。生命历程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解释在普通概念和经验的框架(a comm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ramework)下,个人的生活事件(individual life events)和生活轨迹的社会形式(social patterns of life trajectories);另一个是说明产生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过程^②。社会科学领域对个体的关注有两种视角：心理学主要强调微观水平上个体的功能与发展轨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水平上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与外部动力。很少课题在对个体进行研究时能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领域与领域相沟通。生命历程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联结了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能在多个水平上、联合多种领域开展研究。显然,生命历程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界研究个体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

轨迹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是目前生命历程范式中基本的分析主题。生命历程理论包括四个主要原理,即一定时空中的人类生命、生命的恰当时间、互相依赖的生命、选择和行动中的人类主动性,具体如下所述。第一,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个体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的影响,其面对的社会景观是不一样的,因而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个体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也是不同的。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cohort)产生了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cohort effect)表现出来。第二,个体的发展除了受到其所处时空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即生命的“恰当时间(timing)”,其中暗含社会路线、个人路线以及发展路线等多层面的含义：它是

①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6页。

② Karl Ulrich Mayer,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p.5.